

“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A History of China

Translation in

中国翻译通史

马祖毅 等著

现当代
部分

 **C**hina
湖北长江出版集团
湖北教育出版社

第二卷



目 录

外国文学在中国篇	1
第1章 翻译概况	3
第2章 古希腊罗马文学	33
第3章 俄苏文学	40
第4章 法国文学	132
第5章 英国文学	214
第6章 德国、奥地利文学	298
第7章 东欧文学	427
第8章 南欧文学	461
第9章 北欧文学	492
第10章 欧洲其他国家文学	514
第11章 日本文学	525
第12章 北朝鲜和韩国文学	581
第13章 蒙古人民共和国文学	588
第14章 越南文学	592
第15章 印度文学	595
第16章 南亚其他国家的文学	614
第17章 东南亚诸国文学	619
第18章 古巴比伦文学	626

第 19 章	波斯—伊朗文学	629
第 20 章	犹太—以色列文学	638
第 21 章	土耳其现代文学	646
第 22 章	古代阿拉伯文学和西亚、北非国家阿拉伯文学	649
第 23 章	马格里布及黑非洲的文学	661
第 24 章	美国文学	671
第 25 章	加拿大文学	777
第 26 章	拉丁美洲文学	783
第 27 章	大洋洲文学	847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外国文学在中国篇



第 1 章

翻译概况

五四以来的外国文学翻译,是晚清外国文学翻译的继续,但也有所不同:冯至在《五四以来翻译界的优良传统》一文中说:“有目的地介绍现实主义,尤其是俄国现实主义文学,以及被压迫、被损害的民族的文学,可以说是五四以来翻译界的优良传统。这传统 40 年来从没有间断过,而且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党的领导下得到越来越大的发扬。从 20 年代末期起始的苏联文学的介绍翻译在中国起着巨大的作用,它和我们社会主义文学的成长密切联系着,和我们的革命事业密切联系着,和我们人民的需要密切联系着。”根据《中国新文学大系》的史料索引,从 1917 到 1927 年的 10 年间,翻译外国文学的理论和作品印成单行本的共 225 种。这些作品中间,虽然掺着唯美主义王尔德和象征主义梅特林克的作品,但十之八九是第一流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名著,而俄国 19 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品又占其中的多数。按冯至的统计,在前面所提到 225 种里面,作品有 200 种,俄国的作品则有 65 种,将及全部的三分之一;其他是法国的,约 31 种,绝大部分也是 19 世纪的现实主义作品。俄国的里面,托尔斯泰 12 种,契诃夫 10 种,屠格涅夫 9 种;法国里面,莫泊桑有 11 种。从数目上看来,中国新文学一开始就是看重向外国的现实主义学习的,尤其是俄国的现实主义。另外一方面,像雪莱、拜伦和海涅的浪漫主义诗歌,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以及史托姆的《茵梦湖》——它竟有 3 种译本,后来还有巴金的第 4 个译本——在青年的心中也引起过强有力的共鸣。

从 10 年间翻译出版的 225 种文学理论和作品的国别来说,就有日本、印度、波斯、阿拉伯、俄罗斯和苏联、芬兰、波兰、瑞典、挪威、丹麦、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保加利亚、古希腊、捷克、瑞士、古罗马、法国、英国、美国、荷兰、比利时、意大利、西班牙、犹太和非洲等二十七个国家、民族和地区,可谓洋洋大观。其中被压迫被损害的民族的作品,虽有介绍,但所出单行本并不多,作家也有限,不及当时报刊上发表的数量之大。另一缺陷是当时介绍者的目光往往倾注于东欧北欧各民族,对亚非拉殖民地各民族的文学则注意不够。这种情况,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所补救。

翻译介绍被压迫被损害的民族的文学,其倡导者是鲁迅和茅盾两人。鲁迅在日本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中国翻译通史
现代部分·第二卷

留学时期,舍医从文,决心用文艺做武器,向旧世界宣战。他自己说,那时“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介绍,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盛行着排满,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他广为搜求“叫喊和反抗”的作品,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特别多;同时他又“最愿听世界上爱国者的声音”,认为那声音是“希望看光明的未来,讴歌那簇新的复活,真如时雨灌在新苗上一般,可以兴起人无限清新的生意”,所以他“最注意的是芬兰、斐律宾、越南的事,以及匈牙利的旧事。匈牙利和芬兰文人最多,声音也最大;斐律宾只得了一本烈赛尔的小说;越南搜不到文学上的作品,单见过一种他们自己做的亡国史”。(《随感录》[1918(据手迹)])从1908年开始,在近30年的时间内,鲁迅翻译介绍了匈牙利、波兰、芬兰、保加利亚、捷克、荷兰、西班牙、奥地利、罗马尼亚等9个小国的14个作家的作品。他同情保加利亚过去的遭遇,认为保加利亚人民身上压着“两大害:一是土耳其政府的凶横,一是希腊旧教的锢蔽”(《战争中的威尔珂》译后记)。因此他在保加利亚爱国作家中着重介绍“革命的文人”、“旧文学的轨道的破坏者”、小说家伊凡·伐佐夫的《战争中的威尔珂》和《村妇》,用作者发出的热爱祖国和人民与反对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兄弟民族战争的悲愤叫唤,用作者塑造的反抗土耳其侵略的典型形象,来感染和激励本国读者。他特别推崇“为了祖国而死于哥萨克兵的矛尖上”的匈牙利爱国者、“伟大的抒情诗人”裴多菲,在《摩罗诗力说》中予以介绍后,1908年又翻译了一篇介绍性文章《裴多菲诗论》,到1923年则翻译出裴多菲的6首“至今没有死”的诗篇。不仅如此,他还付出很大的精力支持了孙用翻译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为之校稿和张罗出版;同时又鼓励青年革命诗人白莽翻译裴多菲诗作,希望能介绍一本诗集到中国来。鲁迅提倡介绍被压迫被损害的民族的文学,目的只是“要传播被虐待者的苦痛的呼声和激发国人对强权者的憎恶和愤怒而已,并不是从什么‘艺术之宫’里伸出手来,拔了海外的奇花瑶草,来移植在华国的艺苑”。(《坟·杂忆》)

茅盾(沈雁冰)的早期文学活动,是从翻译开始的。还在1916年,他就在《学灯》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翻译作品——契诃夫短篇小说《在家里》。他在翻译工作中,贯串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认为“介绍西洋文学的目的,一半是欲介绍他们的文学艺术来,一半也为了欲介绍世界的现代思想——而且这是更注意些的目的。”(《新文学研究者的责任与努力》)从此目的出发,他对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文学和革命后的文学非常重视,同时提倡介绍东欧、北欧被压迫民族的进步文学。从1906年到1937年,他翻译出版了9本阿富汗、犹太、印度、挪威、希腊、西班牙及其他弱小国家或民族的作品。他所主编的《小说月报》,从1921年1月10日的第12卷第1期起,到1925年9月10日的第16卷第9期止,共发表了弱小民族的短篇小说、戏剧、诗歌计80余篇,约占翻译总数的百分之四十。《小说月报》还特辟过“被损害民族文学专号”,并在丛刊中出版了李达、沈雁冰、沈泽民、周建人、胡愈之、郑振铎等人译的《北欧文学一瞥》、《丹麦文学一瞥》、《芬兰文学一瞥》、《波兰文学一瞥》(上下集)、《新犹太文学一瞥》以及《瑞典诗人赫滕斯顿》(译诗13首)、《新犹太小说集》、《阿富汗恋歌》、《包以尔》、《泰戈尔诗》和泰戈尔论文集《诗人的宗教》等,占丛刊5集30种之三分之一。

由于鲁迅和茅盾的倡导,20世纪20年代掀起了一股翻译介绍被压迫被损害的民族的文学之风。参加这方面翻译活动的,除上面已提及的人之外,还有王统照、傅东华、陈赅、耿式之、蒋百里、胡仲持、余上沅、钟宪民、张友松、赵景深诸人,而以鲁彦翻译得最多,从1926年至1943年,他一共出版了10部翻译小说集,除两三部外,其他都是波兰、犹太等民族的作家写的小说。

1921年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前后,由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文学革命运动也深入发展了。这时出现的纯文艺刊物,据说有300多种,不少都刊登翻译作品;出现的文艺社团,据说大小,先先后后共有百余个,这些社团的成员,有的兼搞创作与翻译。在这百余个社团之中,最有影响的要算“文学研究会”、“创造社”和鲁迅领导的“语丝社”“莽原社”和“未名社”等。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发起人是郑振铎、沈雁冰、叶绍钧、孙伏园、耿济之、朱希祖、瞿世英、王统照、蒋百里、郭绍虞、许地山、周作人。据赵景深《文学研究会会员录》,经过正式登记的会员约有172人。这个组织虽若有若无地存在了10年左右,但成员成分复杂,思想不一,又无坚强领导,所以组织涣散,缺乏统一的行动计划。然而,它在捍卫中国新文学的方向方面,曾起过不可磨灭的作用,并且积极从事外国名著的翻译介绍,特别注重俄罗斯文学和东欧、北欧被压迫民族文学的翻译介绍。“文学研究会”出版的刊物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及其《文学周报》等。根据不完全统计(缺第172期至第3卷终),《文学周报》刊载过外国文学作品160余篇,涉及14个国家和地区的70多个作家。该会还出版过“文学研究会丛书”,在翻译方面,目的是“介绍世界的文学,创造中国的新文学”,因“出版力与人才太觉缺乏”,“所介绍的世界文学作品,只限于近代的”,“不唯是介绍文学作品,并且也是求这种作品的翻译,也能稍有文学上的价值”,为此“一面力求与原文切合,一面力求翻译艺术的精进”(《文学研究会丛书缘起》)。蒲梢在《初期新文艺出版编目(1919—1923年)》里载有“文学研究会丛书”的翻译小说计5种,即汪馥泉、张闻天译的英国王尔德《狱中记》,耿式之译的俄国安特立夫《小人物的忏悔》,鲁迅译的俄国阿志巴绥夫《工人绥惠略夫》,耿济之译的法国莫泊桑《遗产》和唐性天译的德国斯托姆《意门湖》;翻译戏剧计4种,即潘家洵译的英国萧伯纳《华伦夫人之职业》,邓演存译的英国高尔斯华绥《长子》,耿济之译的俄国安特列夫《人之一生》和高真常译的法国莫里哀《怪客人》;翻译文艺理论计一种,即耿济之译的俄国托尔斯泰《艺术论》。

参加“文学研究会”的作家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翻译外国文学,出版数量最多者为茅盾、郑振铎诸人。茅盾的译作,从1923年至1943年共出版了27种,除弱小民族的作品外,主要是苏联作家的小说,如吉洪诺夫的《战争》、格罗斯曼《人民是不朽的》、巴甫连科《复仇的火焰》、卡达耶夫《团的儿子》等都是。郑振铎的译作,从1921年至1936年,共出版了19种,除印度泰戈尔的诗集《飞鸟集》、《新月集》等之外,有俄国戏剧如奥斯特罗夫斯基《贫非罪》和契诃夫《海鸥》,俄国小说如阿志巴绥夫《血痕》与《沙宁》,其他则是《希腊神话》、《莱森寓言》、《印度寓言》和《高加索民间故事》等。他之所以翻译这些民间故事和寓言,与他致力研究民俗学有关。他还主编过“世界文库”,按照他的计划,在当时可说是非常庞大的。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in China
中国翻译通史
现代部分·第二卷

“世界文库”由生活书店发行,在1935—1936年间只出了12册,所收译作仅60余种,有西班牙塞万提斯《吉珂德先生传》(傅东华译);法国巴尔扎克《一件恐怖时代的轶事》(徐霞村译),《不可知的杰作》、《再会》(均穆木天译),莫泊桑《〈笔尔和哲安〉序》(黎烈文译),司汤达《迷药》、《箱中人》、《圣福朗且斯考教堂》、《费理拜·顿嘉勒》、《法妮那·法尼尼》、《贾司陶的女住持》(均李健吾译),泰纳《梅里美论》、《英国文学史序论》(均逸夫译),蒙田《散文选》(梁宗岱译),P·罗逖《冰岛渔夫》(黎烈文译),博马尔舍《塞维勒的理发师》(马宗融译),罗曼·罗兰《狼》(沈起予译);波兰显克威兹《游美杂记》(茅盾译);希腊波卢塔《纶缪拉斯》(胡仲持译);德国海涅《英吉利片断》(茅盾译),尼采《苏鲁支如此说》、《启示艺术家与文学者的灵魂》(均梵澄译);英国斐尔定《散文的〈喜剧的史诗〉》(茅盾译),兰姆《书简选》(赵邦铤译),渥兹华斯《抒情诗歌集序言》(曹葆华译),勃朗特《简爱自传》(李霁野译),哈代《玫瑰》(曾季肃译);美国欧文《妻》、《鬼新郎》(蹇先艾、陈家麟译),霍桑《步福罗格太太》、《牧师的黑色面纱》(蹇先艾、陈家麟译),赫忒《田纳西的伙伴》、《红谷牧歌》(均蹇先艾译),亨利·詹姆士《四次会晤》(蹇先艾译),爱伦坡《发人隐私的心》(蹇先艾译)、《西亚尔之家的衰亡》(蹇先艾、陈家麟译);俄国与苏联有果戈理《死魂灵》(鲁迅译),托尔斯泰《郭尔内·瓦西斯耶夫》(高滔译),梭罗古勃《小鬼》(徐懋庸译)、《杜兰蒂娜》(高滔译),蒲宁《忆契诃夫》(茅盾译),尼克拉索夫《严寒,通红的鼻子》(孟十还译),陀斯退夫斯基《温淑的心》(高滔译),高尔基《马尔华》(陈节译),罗马涅维德《拟情书》(茅盾译)……如此等等,可谓琳琅满目。

参加过“文学研究会”的其他作家,也有从事外国文学作品翻译者,如沈泽民,沈雁冰之弟,专事翻译。曾游俄近8年,回国后于1934年病死于江西。主要译作,部分收入《雪人》中。安特列夫《邻人之爱》及其他多种皆未收集。商务印书馆曾出版过他所译的法国弗罗贝尔《坦白》。耿济之和耿式之主要翻译俄国文学。耿济之译有屠格涅夫《猎人日记》、《父与子》、《林中之月》,托尔斯泰《复活》、《黑暗之势力》、《艺术论》,契诃夫《短篇小说集》,陀斯退夫斯基《兄弟们》(第一部),奥斯特洛夫斯基《雷雨》等。耿式之译有契诃夫戏曲三种:《伊凡诺夫》、《万尼亚叔叔(按系舅舅)》和《樱桃园》以及安特列夫小说《小人物的忏悔》等。徐调孚是儿童文学译者,译过《木偶奇遇记》、《母亲的故事》、《日本故事集》、《女人鱼》、《我的童话》等。赵景深的译作较多,主要有《契诃夫短篇小说集》8册,屠格涅夫《罗亭》和《安徒生童话集》、《格林列姆童话集》等。傅东华的译作也不少,除上面已提到的之外,主要有亚里士多德《诗学》、《社会的文学批评论》、《近世文学批评》、《文学之近代研究》、《比较文学》、《奥特赛》、《失乐园》、《参情梦》(英美7家8首诗)以及比利时梅脱灵《青鸟》,美国密彻尔《飘》和德莱塞《真妮姑娘》、《失恋复恋》等。黎烈文留学过法国,除主要翻译法国小说外,尚译有日本芥川龙之介《河童》,匈牙利霍尔基斯《第三帝国的士兵》和捷克卡培克等著的《期待之岛》等。樊仲云译有厨川白村《文艺思潮论》,屠格涅夫《烟》、《畸零人日记》,法英俄波五家集《这便是人生》等。此外,张闻天译有科洛连科《盲音乐家》和安特列夫《狗的跳舞》;许地山译有《孟加拉民间故事》;王统照译有《题石集》(1942年自印的译诗集),其中包括汤姆斯摩耳诗16首,亥特曼夫人诗10首,勃雷柏特6首,凯拉

苏塞娜斯基诗1首;谢婉莹(冰心)译有叙利亚纪伯伦《先知》。

与“文学研究会”对峙而影响最大,历史最久的文学团体是“创造社”。该社于1921年7月由留日学生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田汉、郑伯奇等组成。1922年5月,他们创办了《创造季刊》,其后又相继出版了《创造社丛书》、《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半月刊和《创造月刊》,逐渐形成了一种有声势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在创造社的后期,他们又提出革命文学的主张。至1929年2月,创造社为国民党当局查封。

《创造季刊》于第1卷第4期出过“雪莱纪念号”,有郭沫若、成仿吾译的雪莱诗9首。《创造周报》曾刊载过郭沫若译的尼采作品26篇及歌德的《迷娘歌》。《创造日》载过歌德、海涅、渥兹华斯、雨果、斯托姆诸家的诗篇及《歌德传》,译者为郭沫若、成仿吾、金柄章和邓均吾等。创造社所办的刊物,总的情况是创作多于翻译。但它的社员中都有不少是兼事翻译的,郭沫若就是一个。

从1925年至1947年,郭沫若共出版过29种译作,其中有波斯加亚谟《鲁拜集》,歌德《少年维特之烦恼》、《浮士德》、《赫曼与窦绿台》,席勒《华伦斯泰》,斯托姆《茵梦湖》,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辛克莱《屠场》、《煤油》、《石炭王》,高尔斯华绥《法网》、《银匣》以及马克思、恩格斯《艺术的真实》等。五四运动的革命浪潮,大大激荡起郭沫若的爱国主义热情。他当时在日本留学,曾组织起一个抗日社团“夏社”,专门搜集日本报纸杂志上侵略中国的言论和资料,翻译成中文,向国内各学校各报馆投寄,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这是郭沫若利用翻译为政治服务的一个事例。据他自述从事诗歌创作的历程,说他在五四以前受过印度泰戈尔的影响,五四时期为美国惠特曼的诗风所感染,后来又接近了德国的歌德。他很早就译过《泰戈尔诗选》和《草叶集选》,可惜原稿均散失无存。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他对外国文学的介绍事业,则是从歌德的作品开始的。在五四运动高潮中,他就着手翻译歌德《浮士德》,他感觉到“我们的五四运动有点像青年歌德时代的狂飚突起运动,同是由封建时代蜕变到现代的一个划时代的历史时期。因为有这样的相同,所以我和青年歌德的心弦起了共鸣,差不多在一种类似崇拜的情中,把第一部译了。那时翻译仿佛等于自己创作的一样,我颇感觉着在自己一生之中做了一件相当有意义的事”。(《〈浮士德〉第二部译完后记》)《浮士德》第一部的译稿,经过十年,在创造社有了自己的出版部的时候才能和读者见面。第二部的完成,那是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之后的事了。与第一部的出版,相隔30年之久。这是他一生中介绍外国文学的最后一次劳作。在这同时期内,他又搜集整理了过去所译的外国诗歌,编成一个总集,名为《沫若译诗集》,分《初期译诗集》、《雪莱诗选》和《鲁拜集》三部分。《少年维特之烦恼》出版于1921年。这个译本曾震动了当时中国的一代青年。“青年男子谁个不善钟情?妙龄女人谁个不善怀春?这是我们人性中的至圣至神;啊,怎么从此中会有惨痛飞进?……”歌德这首《维特与绿蒂》小诗中的诗句,在当时青年的口中流传不息。楼适夷认为:“这无疑是与沫若同志的传神之笔分不开的。”“他提出翻译外国文学必须有创作的精神,为此就必须对原作有精深的研究和正确的理解,视该作品的表现与内涵,不啻为自己所出,乃从而为不得已的移植!……他在翻译中实践自己的主张,都是通过对原作的精深的研究与正确的理解,以创作的精神来翻译的。我们读他的译作常常感到好像读他自己的创作,似乎

中国翻译通史 现当代部分·第二卷

根本不存在两国文字的界限,没有移植的痕迹,因为他把原作的精神实质和艺术风格溶注在自己的笔端,进行了思想与艺术的再创造。创造社初期曾提出‘神韵译’的口号,郭沫若同志的翻译可说正是这口号的最高实践。”(见楼适夷《漫谈郭沫若同志与外国文学》)1942年,郭沫若翻译了河上肇的《社会组织与社会革命》一书,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据他自己说:“我从前只是茫然地对于个人资本主义怀着的憎恨,对于社会革命怀着的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这书的译出,在我一生中形成一个转换期。把我从半睡里唤醒了的是它,把我从歧路的彷徨里引出了的是它,把我从死的暗影里救出的是它……”(《沫若自传》)可见此书的翻译,为他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郭沫若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思想家、历史学家、伟大的诗人和作家,他与鲁迅同是我国新文学的奠基者。他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外国文学的优秀作品,仅是他生前做出的伟大功绩的一小部分而已。

参加过创造社的作家曾兼事翻译者还有郁达夫,他译过英国淮尔特《杜莲格来》,德国霍特曼《沉钟》及《几个伟大的作家》,出版了《达夫所译短篇集》(包括德国、芬兰、爱尔兰等国作家小说八篇)等。郑伯奇是戏剧电影作者,译过法国葛尔孟《鲁森堡之一夜》,伊诺斯《喀尔巴阡山狂想曲》以及和别人合译的《电影导演论》和《短篇小说集》(学艺汇刊)。王独清译有但丁《新生》和《独清译诗集》。穆木天所译较多,有纪德《窄门》,巴尔扎克《短篇集》、《从兄蓬斯》、《巴黎烟云》,法朗士《蜜蜂》,高尔基《初恋》,涅维诺夫《塔什干》,赛甫林娜《维里尼亚》以及和别人合译的普希金《青铜的骑士》和莱蒙托夫《恶魔及其他》等。

鲁迅在《我和〈语丝〉的终始》一文里说:“同我关系较为长久的,要算《语丝》。”“大约这也是原因之一罢,‘正人君子’们的刊物,曾封我为‘语丝派主将’,连急进的青年所做的文章,至今还说我是《语丝》的指导者。”《语丝》周刊创办于1924年11月,长期撰稿的有鲁迅、钱玄同、章川岛、孙伏园等12人,主要是刊载杂文。在北京出至154期被查封。这期间鲁迅仅是经常撰稿而已。1927年12月,《语丝》在上海复刊,鲁迅才负责编辑半年,后交柔石代编,又半年后柔石也辞去。《语丝》在上海出至265期,于1930年3月停刊。据初步统计,《语丝》在北京期间刊登译作较少,仅59题(诗歌数首仅算一题,如《译诗四首》之类),翻译数量较多者是刘复。移至上海出版,刊登译作则显著增多,计96题,译者除鲁迅和柔石外,有郁达夫、徐霞村、韩侍桁、杨骚、许天虹、汪馥泉、章衣萍、沈端先、赵景深、王鲁彦等,约47名之多。

1925年4月间,“北京突然有莽原社出现,这其实不过是不满于《京报副刊》编辑者的一群,另设《莽原周刊》,却仍附《京报》发行,聊以快意的团体。奔走最力者为高长虹,中坚的小说作者也还是黄鹏基、尚钺、向培良三个;而鲁迅是被推为编辑的。但声援的很不少,在小说方面,有文炳、沅君、霁野、静农、小酩、青雨等”(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莽原》周刊出至32期停刊。一月之后,又出《莽原》半月刊,历时约为两年。半月刊所载译文多于周刊。经常提供译稿者,除鲁迅外,还有李霁野、尚钺、向培良、韦丛芜、杨丙辰、画室(冯雪峰)、胡庭芳、王乐、高滔、曹靖华等人。

“未名社”是由“未名丛刊”起始的。1924年,鲁迅也为北新书局编两种丛书,“乌

合丛书”专收创作,“未名丛刊”专收翻译。当时翻译书籍销路冷淡,遂由韦素园等接洽发行,这就是“未名社”。鲁迅说:“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壮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且介亭杂文·忆韦素园君》)。“未名社”的主要负责人是韦素园,其他翻译最努力的是曹靖华、韦丛芜、李霁野等人,出版过《苏俄文艺论战》(任国桢译)、《文学与革命》(托洛斯基著,韦素园、李霁野合译)、《烟袋》(苏联短篇小说集,曹靖华译)和《第四十一》(苏联B·拉甫列涅夫著,曹靖华译)等。到1928年1月,“未名社”创办了《未名》半月刊,在鲁迅领导下,以翻译和介绍外国文学,特别是俄罗斯和苏联文学为主,译者除未名社社员外,还有戴望舒、杨丙辰等。鲁迅在1934年说:“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非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介绍了果戈理(N·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Dostoevsky),安特列夫(L·Andreev),介绍了望·葛覃(F·Van Eeden),介绍了爱伦堡(I·Ehrenburg)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B·Lavrenev)的《四十一》,还印了《未名诗集》……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曾几何时,他们就都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都至今没有枯死。”(《忆韦素园君》)。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新民主主义论》)。他一生用以同敌人战斗的主要武器是文艺,而他的文学生涯一开始就是从事于外国文学的翻译介绍,几与创作并重,当《死魂灵》第二部第三章翻译完了时,正是1936年5月15日,而他的逝世却是10月19日。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内,他翻译了300余万字,和创作量几乎相等。所译作品,若以原作的国别分类,计俄国、苏联37人,日本35人,德国7人,法国5人,匈牙利3人,芬兰、荷兰、奥地利各2人,英国、西班牙、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捷克各1人,共14国,99个作家。其中俄苏作家著作的翻译量约160多万字,占他翻译总数量二分之一强,占他的全部著述量四分之一强。

鲁迅为什么如此重视俄国和苏联文学呢?他本人在《祝中俄文字之交》里作了回答:“15年前,被西欧的所谓文明国人看作半开化的俄国,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15年来,被帝国主义者看作恶魔的苏联,那文学,在世界文坛上,是胜利的。这里的所谓‘胜利’,是说:以它的内容和技术上的杰出,而得到广大的读者,并且给与了读者许多有益的东西。”当然,“内容和技术”这两者鲁迅更注重于“内容”。他一开始就主张“文学必须为人生,而且要改良人生”。而“俄国的文学,从尼古拉斯二世时候以来,就是‘为人生’的”(《〈竖琴〉前记》),读者“从那里面,看见了被压迫者的善良的灵魂,的酸辛,的挣扎”,从而“从文学里明白了一件大事,是世界上有两种人:压迫者和被压者!从现在看来,这是谁都明白,不足道的,但在那时,却是一重大发现,正不亚古人的发见火的可以照暗夜,煮东西”(《祝中俄文字之交》)。鲁迅正是要借俄国文学的火,来照中国的暗夜。

鲁迅在培养翻译工作的新生力量方面也花了不少心血。他曾说过:“我希望中国有许多好的翻译家。”1934年,他倡议创办《译文》月刊,既是为了“私运军火给造反的奴隶”,也是为了培养新的译者。如《译文》就大量刊载过孙用的译作。孙用原是在邮

History of Translating in China
中国翻译通史
现代部分·第二卷

局里工作的一个青年,在鲁迅的关怀与培养下成了优秀的翻译工作者。孙用译了一本《勇敢的约翰》,寄给鲁迅。鲁迅阅后马上回信,称赞他的“译极好,可以诵读”。为了介绍出版单行本,鲁迅共费两年时间(1929年11月6日—1931年11月8日),“好不容易找到一家小书店给印了,自己又垫付出几百元的制版费,连奔走劳力不计,待书店付还一部分制版费,鲁迅就急急又先垫付给作者的版税了”。他是“丢开自己,首先为他人设想”(许广平《鲁迅回忆录》)。鲁迅在编《奔流》、《语丝》时,抽出不少时间给青年修改校对译稿。“如果那原文先生能自己对照的,多给改正。其为从英文译来,遇有疑难,亦必多方向人打听,修改妥善。”(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来稿如尚可用,则必多方设法登载。鲁迅自己也说过:“我在过去的近十年中,费去的气力实在并不少,即使校对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有利用的意思”(《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

林如稷、陈翔鹤、冯至等在1922年和1925年先后组织过“浅草社”和“沉钟社”,断断续续存在了11年,鲁迅称之为“中国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他们出刊物,搞翻译,对介绍德国文学,努力最多。他们还出过“沉钟文艺丛书”四种,其中有杨晦译的《悲多汶传》。冯至在1935年出版过海涅的《哈尔次山游记》,在1937年出版过德国里尔克《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

1928年,在中国共产党的具体领导下,蒋光慈、钱杏邨等发起成立“太阳社”,成员还有沈端先、孟超、刘一梦、冯宪章、华汉、顾仲起等。当时“太阳社”的成员全部是党员,有自己的党组织。他们先后编辑出版过《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新流》、《拓荒者》等刊物。他们的口号是提倡革命文学,为新时代的新文艺而战斗,为建立无产阶级文学而努力。在翻译方面,可以介绍一下蒋光慈和沈端先。

蒋光慈,原名光赤,安徽六安人,出身小康之家。五四运动时参加学生运动,不久入党,被派去苏联留学,1925年初回国。他从事诗歌小说的创作,兼搞翻译,在1930年及1931年间出版过苏联李别金斯基《一周间》、罗曼诺夫《爱的分野》(与陈情合译)和新俄小说集《冬天的春笑》。1931年病故于上海。

沈端先,即夏衍。从1928年至1947年出版的翻译作品计19种,均为苏联和日本作品,如高尔基《母亲》、《没用人的一生》、《奸细》,金子洋文《地狱》,藤森成吉《牺牲》,芥川龙之介《败北》以及《平村泰子集》、《有岛武郎集》等。

瞿秋白的文学活动中,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革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工作,乃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早在1920年,瞿秋白还在北京俄文专修馆学习的时候,就曾翻译了果戈理、托尔斯泰、契诃夫等人的短篇作品8篇。他是最早从俄文直接翻译俄罗斯文学的译者。他认为“翻译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名著,并且有系统的介绍给中国读者——这是中国普罗文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他在翻译苏联文学作品方面,主要力量是用在介绍苏联文学的创始人高尔基的作品上。1932年,他译出了《高尔基论文选集》和《高尔基创作选集》两部分,还译了高尔基的两篇早期创作:《二十六个和一个》和《马尔华》,重译了短诗《市俗颂》。往后,他又译了卢那卡尔斯的剧本《解放了的唐吉珂德》和讽刺诗人别德内依的长诗《没工夫唾骂》,革拉特珂夫的长篇小说《新土地》,绥拉菲摩维支的短篇小说《一天的工作》和《岔道夫》等。他还翻译了德国

工人作家马尔赫维察的小说《爱森的袭击》。这部小说是记载工人起义的情况,1930年写成后就遭到德国反动政府的压迫,禁止出版。1933年瞿秋白通过俄译本特将它译成汉语。瞿秋白的译文既信且达,具有明白、流畅、传神的特色。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方面,1932年,瞿秋白根据苏联马列主义学院出版的《文学遗产》第一、二两期的材料,结合中国当时的文艺思想斗争,编译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现实》一书。不久以后,他又翻译了列宁论托尔斯泰的几篇文章,《现实》中辑辑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和列宁论托尔斯泰的文章,都是第一次被介绍到中国来的。

1922年,中华书局开始出版“中国少年学会丛书”,其中有李劫人译的法国都德的《小事件》和莫泊桑的《人心》两种。李劫人,即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四川人,是法国文学翻译者。到1945年,他共译了法国作家作品91种,其中有都德的《达哈士瓦的狒狒》和福楼贝尔的《萨朗波》等。另一个湖南人李青崖,也是致力于法国文学翻译的。他译过《法兰西短篇小说集》和《莫泊桑短篇小说集》(三卷),其后又有译《莫泊桑全集》的计划,到1941年,印出《哼哼小姐》、《苾威狄》、《鸬鹚》、《羊脂球》、《霍多父子》、《遗产》、《珍珠小姐》、《蔷薇》、《蝇子姑娘》、《天外》、《橄榄田》等11种。除此以外,他还译过左拉的《巴黎的肚子》和《萌芽》以及西班牙伊本涅兹的《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商务印书馆出过“共学社丛书”,从1921年开始,据蒲梢所记,该丛书有翻译的剧本6种,小说两种。小说中有徐志摩译的德国福沟《冯堤孙》。徐志摩,浙江海宁人,曾在英国研究文学。后来成为“新月社”的主将,主编过《晨报副刊》、《诗刊》、《新月》等。1931年因飞机失事遇难。他的译作还有法国服尔德《慧第德》和《曼殊斐尔小说集》。新月派诗人朱湘译过《路曼尼亚民歌》。此外,象征派诗人李金发译过皮里蒂司《古希腊恋歌》;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则译有《法兰西现代短篇集》、《比利时短篇小说集》、《意大利短篇小说集》、《西班牙短篇小说集》、《洛尔伽诗钞》、伊巴涅思《短篇小说选》及其《良夜幽情曲》多种。

毛泽东说:“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文学和艺术是一个重要的有成绩的部门。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在十年内战时期有了大的发展。”(《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个发展,是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与存在分不开的。“左联”正式成立于1930年3月2日。参加的作家有鲁迅、茅盾、周扬、沈端先、郁达夫、田汉、柔石、蒋光慈、冯乃超、洪灵菲、钱杏邨等50余人。在成立大会上,总结了过去文艺运动的经验,指出目前文学运动的任务,成立了常务委员会,并通过成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发动左翼艺术同盟的组织,确定各左翼杂志的计划等十七件提案。“左联”首先出版的杂志为《世界文化》,以后陆续出版的有《萌芽》、《拓荒者》、《大众文艺》、《北斗》、《文学月报》、《文艺新闻》等刊物。“左联”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高举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旗帜,团结了革命作家和进步作家,译介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建设无产阶级文学而奋斗,推动了“文化革命的深入”。

“左联”在20世纪30年代把马列有关文艺理论的最主要的论著基本上都翻译过来了。据张大明先生择要统计,有下列数种:

History of Translations in China 中国翻译通史 现代部分·第二卷

一、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摘译：《论文文化的各种形态（科学、技术、艺术）的不平衡发展》，译名为《艺术形式之社会的前提条件》，载1930年《萌芽》月刊第1期；

二、马克思《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二文的摘译，译名为《马克思论出版的自由与检查》，载《萌芽》月刊第5期；

三、《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的信》（论现实主义，论巴尔扎克），载1933年出版的《读书杂志》第3卷第6期；

四、《恩格斯致敏·考茨基的信》（论倾向文学，典型创造），鲁迅的《关于翻译》（1933年8月2日）摘录重要段落，全文载于1934年12月16日出版的《译文》第1卷第4期，又见1937年初出版的《恩格斯等论文学》；

五、《恩格斯致爱因斯坦的信》（论易卜生），见东京质文社出版的“文艺理论丛书”之六《作家论》；

六、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载1930年2月10日出版的《拓荒者》第1卷第2期，译名为《论新兴文学》（成文英译），又见同年12月出版的《苏俄文学理论》第三章附录，题为《伊里基论新兴文学》；

七、列宁：《列夫·托尔斯泰是俄国的镜子》，载1928年10月10日出版的《创造月刊》，又见1934年9月25日出版的《文学新地》创刊号，还载了《恩格斯等论文学》；

八、列宁：《列夫·托尔斯泰》，见《恩格斯等论文学》；

九、列宁：《列夫·托尔斯泰与现代工人运动》，见《恩格斯等论文学》；

十、1936年，鲁迅以诸夏怀霜社的名义，编辑出版了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集中有瞿秋白1932年编译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论集：现实》和1933年译成的《列宁论托尔斯泰》两组文章。

又，1933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了《列宁与艺术》。本书较为全面和系统地搜集了列宁对于艺术的言论。

在一些翻译和文章中，还比较完整地介绍了马克思论文艺的起源、论欧洲历史上几个时期的代表作家，列宁对蔡特金谈文学该为大众、论每个民族都有“两种文化”、《共青团的任务》中关于批判继承人类全部文化遗产的论述。（《三十年代左翼文艺界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的宣传》）

这时期对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翻译介绍，除鲁迅和瞿秋白外，还有冯雪峰、沈起予等人。冯雪峰翻译出版过普列汉诺夫《艺术与社会生活》，卢那卡夫斯基《艺术之社会的基础》，德国梅林格《文学评论》以及《艺术社会学底任务及问题》等。沈起予译了高尔基《戏曲论》和《儿童文学的“主题”论》。他还和徐懋庸分别译了马尔罗《报告文学的必要》和梅林《报告文学论》。周立波则翻译了捷克著名记者基希反映中国现实生活的报告文学《秘密的中国》。这对当时报告文学的兴起起了一定的作用。1930

年鲁迅主编的文艺季刊《文艺研究》，在仅出的一期中主要是介绍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有鲁迅译的普列汉诺夫《东勒芮绥夫斯基的文学观》，还有冯雪峰译的《现代欧洲无产阶级文学的路》和《资本主义与文艺》。比较早一些，陈望道也译过《文学之技术的革命》和《苏俄文学理论》。

关于外国进步文学作品的翻译，此时期也是方兴未艾，以“左联”刊物《萌芽》为例，它在《扩充篇幅及确定今后内容的启事》里就确定内容之一为“新文艺作品底创作及翻译介绍”。综观第一卷全卷，翻译介绍的分量是相当大的，有从第一期即连载的鲁迅所译法捷耶夫长篇小说《溃灭》（即《毁灭》），有革拉特珂夫、巴比塞等的短篇，也有弗里契、高尔基等论文和介绍。1933年7月创刊的《文学》，出到9卷第4期。1卷2期为“屠格涅夫纪念号”，7卷2期为“高尔基纪念特辑”，2卷5期则全是18个弱小民族的作品。总计《文学》刊载的翻译小说、诗歌、戏剧、论文等约有一百三四十篇，译者有郑振铎、黄源、曹靖华、周扬、耿济之、傅东华、徐懋庸、洪深、沈起予、黎烈文、卞之琳等六七十人。而1934年创刊的《译文》（共出29期）更是专门致力于外国进步文学的介绍。鲁迅译的《死魂灵》第二部就是从新1卷第1号开始连载的。发表译作较多者有黎烈文、孙用、许天虹、孟十还、茅盾、巴金等人。鲁迅在这时期除了翻译革拉特珂夫的《表》和法捷耶夫的《毁灭》外，还介绍出版了革拉特珂夫的《士敏土》、伊凡诺夫的《铁甲列车》、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他谈到《毁灭》和《铁流》时说：“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描写多愁善病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的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二心集·关于翻译的通讯》）。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一切活动，紧密结合了中共的总的革命运动，真正成为党的工具，成为党的革命事业的不可缺少的一个部门。国民党反动政府为配合它的军事“围剿”，在其统治区内进行文化“围剿”，对“左联”采取残酷的压迫。他们制定出反动的“出版法”，成立“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对当时的文艺刊物和进步作品，横加监视和删削，或禁止发行。1934年2月，上海一地就有149种文艺书籍被国民党中央党部禁止出售，其中翻译作品有54种，连洪灵菲译的陀斯退夫斯基《地下室手记》和《赌徒》，钱杏邨（阿英）译的《劳动的福音》，楼建南（楼适夷）译的《苏俄短篇小说》、《苏联童话集》、《穷儿苦狗记》、《恶党》等等都在被禁之列。国民党还派遣特务，收买大批流氓，对进步的文化机关肆行破坏，例如捣毁当时进步的艺华影片公司，疯狂逮捕和暗杀进步作家。共产党员作家柔石、殷夫、胡也频、李伟森、冯铿于1931年2月在上海龙华被枪杀。另一个共产党员作家洪灵菲，1933年在北京被捕，也被秘密枪杀。还有诗人潘漠华被杀于天津。鲁迅则遭到通缉。然而真正的革命作家并没有被吓倒，他们以顽强不屈的精神继续战斗。正如鲁迅所说：“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却仍然滋长，因为这是属于革命的广大劳苦群众的，大众存在一日，壮大一日，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也就滋长一日。我们的同志的血，已经证明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革命的劳苦大众是在受一样的压迫，一样的残杀，作一样的战斗，有一样的命运，是革命的劳苦大众的文学。”（《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

“左联”五烈士不但是作家，而且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其中李伟森、柔石、殷夫还是优秀的翻译工作者。李伟森，一名求实，湖北武昌人，生于1903年。五四运动爆

History of Translating in China 中国翻译通史 现代部分·第二卷

发后,积极参加恽代英领导的武汉学生爱国运动。1921年入党。1924年被团中央选派赴苏学习。1925年回国后曾任团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与萧楚女合编《少年先锋》杂志。以后担任过湖南团省委书记、团中央委员兼宣传部长,参加过广州公社起义,办过党报《上海报》(后改名《红旗日报》),还参加领导“左联”的工作。其译作多未结集,有关文学方面的,如短篇小说有:俄契诃夫《范伽》(载1922年5月7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美巴苏《寂寞的地位》(载1922年12月《妇女杂志》第8卷第12号)、须林娜《猎人》(载1922年4月《学生杂志》第11卷第4号)、剧本美马连斯《说谎人》(载1924年2月《妇女杂志》第10卷第2号)以及《朵思退夫斯基与屠格涅夫(关于他们的争端之信件)》(载1928年4月《语丝》第4卷第17、18期)、《朵思退夫斯基(朵思退夫斯基夫人之日记及回想录)》(1928年6月上海北新书局初版)、《不幸的预言》(载1928年6月1日《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14期)、《最后的一个哈孟雷德》(载1928年10月16日《北新》半月刊第2卷第23期)等。

柔石,原姓赵,名平福,1902年出生于浙江省海宁县。1923年毕业于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在慈溪县普通小学教书,自费出版过小说《疯人》。1925年去北京大学旁听,年底回浙江任中学教员和教务主任。1927年任宁海县教育局局长,因预闻1928年5月宁海县农民起义事受牵连,乃逃到上海,与鲁迅结识,1928年编《语丝》约6个月。1928年1月,鲁迅与柔石创立“朝花社”,合资刊印《朝花周刊》(后改旬刊)。柔石曾是自由大同盟的发起人之一。1930年入党。在“左联”被推为常务委员和编辑部负责人,主持《萌芽》月刊的编辑工作。柔石的译作,结集出版的有卢那卡夫斯基《浮士德与城》和高尔基《颓废》(即《阿尔泰莫诺夫之事业》),与别人合译的为《奇剑及其他》、《在沙漠上》、《高尔基文录》、《竖琴》、《高尔基论文选集》、《苏联作家二十人集》(以上均是与鲁迅等人合译)和《丹麦短篇小说集》(与林淡秋合译)。其他若干短篇则散见于《语丝》、《朝花周刊》、《朝花旬刊》、《奔流》等文艺杂志。柔石曾与鲁迅合编过“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北欧文艺丛书”和“朝花小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曾出二集,即《奇剑及其他》和《在沙漠上》,预定第三集为鲁迅等译的《果树园及其他》,后未出版。“北欧文艺丛书”,预定出版《维多利亚》(挪威哈谟生中篇小说,鲁迅译)、《挪威短篇小说集》(上册,梅川译)、《瑞典短篇小说集》(上册,真吾译)和《丹麦短篇小说集》(上册,柔石译),后因故未出。“朝花小集”预告出版5种:捷克斯惠忒拉《接吻》(真吾译)、匈牙利至尔妙伦《小彼得》(许霞译)、俄国果戈理《伊凡吵架的故事》(鲁迅译)、《二月》(柔石作)和西班牙塞万提斯《吉珂德先生》(上部第一册,梅川译),但仅出《接吻》一种。《小彼得》、《二月》后改由春潮书店出版,其余未见出书。

殷夫,又名白莽,原名徐柏庭,1907年生于浙江象山县大徐村,十三四岁即学写诗。17岁到上海,先后进民立中学和浦东中学,与革命发生联系。1927年4月被捕,囚禁3个月放出,他有《在死神来到之前》叙事长诗记其事。同年秋入同济大学,不久脱离,全力进行革命活动。1929年又一次被捕于丝厂罢工中。他原是“太阳社”社员,参加过《列宁青年》的编辑工作。于革命活动之余,从事诗歌创作。牺牲时年仅22岁。他的译作有《彼得斐·山陀尔行状》、《彼得斐·山陀尔诗九首》(均载1929年11月《奔流》第2卷第5期)及约翰赫德《军国主义批判》(载1929年12月15日《摩登青